

关于“重写文学史”

王春庭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近几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颇为高涨,据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个口号”^①,一种“学术思潮”^②。尽管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已经陆续问世,但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还是不满于现状,希望有更多的充满思辨色彩的、有理论深度和美学意蕴的文学史著作出版。为此,笔者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读者的角度,就“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涉及的若干问题,略抒管见,以求教于文学史方面的专家学者。

对现行几部文学史的一点评价^③

目前,全国各高等院校中文系普遍使用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是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这两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文学史著作。他们是为适应高校文科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属于教科书性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两部文学史与高校古典文学的教学实践是基本适应的,因为它们详略得当,史的线索比较清晰,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和评价也恰到好处,能给予同学以比较系统的文学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念。尽管此后一些高校曾经自发组织、编写了好几种新的文学史教材,但据笔者所知,迄今没有一部文学史能够轻易地取而代之。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这两部严肃的、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科学体系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哺育了一代学人,造就了难以数计的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一九七八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以来,古典文学始终是一门最为热门的专业。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博士脱颖而出,成为古典文学教学、科研的一支生力军。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它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归功于现行几部文学史(除这两部以外,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等等)的教育和普及。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科研的不断深入,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研究视野的扩大和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现行的几部文学史也暴露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加以更新。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在游国恩和社科院两部文学史出版不久,郭预衡先生就曾从不同侧面批评了这两部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怎样更好地从史的角度来写文学史的问题,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关于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与文学现象、文艺思潮如何结合的问题,等等^④。这些问题,在这两部文学史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近几年,一些文学研究者越来越不满意现行几部文学史的“学术缺陷”,从学术框架、哲学深度、美学意蕴、理论素养、思辨色彩等方面提出批评^⑤。所有这些意见表明,编写一部或多部新

文学史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的迫切需要。现在看来,现行几部文学史的缺陷是失之于浅,宏观研究的成分太少,涵盖面和容量不够。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隋唐五代部分)为例,全书十三章,唐诗介绍用了整整八章,唐代散文、唐传奇、唐五代词、唐代变文各只占一章,这个结构是很不合理的。虽然,唐代文学的各种样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叙述分量的过分悬殊,是无法体现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全貌的。有人说,这可能受了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的影响,因而以编概全,事实正是如此,其他三册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上,仅对三十年来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两部文学史著作略作评价,限于篇幅,对其他几部文学史著作就略而不谈了。

对近几年出版的几部文学史 新著的一点印象

为了适应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科研的需要,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就已经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大型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编纂。目前,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两册,其他十二册可能正在陆续付梓之中。“编者说明”指出,“各册自成起迄而互作适当照应,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从已经出版的这两册文学史来看,无论是结构框架、理论色彩还是学术水平等方面,都比原先的那套文学史前进了一大步。但也不必讳言,这部文学通史在体例上与以前的几部文学史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各种文体和作家作品的分章设置方面更趋合理,宏观研究的分量增加了。但由于这套大型的文学通史尚未出齐,尚未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评论。

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新著还有不少^⑥。就笔者已经读到的,有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葛晓音的《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韦凤娟、陶文鹏、石昌渝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许总的《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3月)、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和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等等。还有一些文学史著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至今未能读到,深以为憾。

下面,拟就读过的四部具有一定代表性和鲜明特色的文学史新著谈一点印象,这些印象只是随感而发,在叙述的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甚或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则请编著者和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文学史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综合的文学通史,二是断代文学史,三是分体史,四是分体断代史。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断代文学史。首先,在章节的安排上,对初唐散文、初唐白话诗、盛唐散文、唐初及大历末的小说,都立有专章进行介绍,这些内容,是过去几部文学史所忽略的。而对盛唐诗人,则依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分章描述,这就突破了以往把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分为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传统写法,更能显示盛唐诗坛霞蒸云蔚的时代风貌,这也就是文学史家所谓的盛唐气象。其次,在分析作家作品的时候,注重于艺术风格、艺术特征的揭示,这就克服了以往几部文学史重思想轻艺术的偏颇。而这样写无疑更能显示一个时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美学风貌。本书的重要特色,还表现在对各时期

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精辟阐述方面。比如,对初唐诗人王绩的评价,指出庄子思想在王绩的出处行藏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他人生境界的主要方面。这就探得王绩思想的主脉,所引例证亦十分雄辩有力。在此基础上,编者进一步论述以庄子思想为核心的玄学进入中国士人的生活之后所引起的精神升华和人生境界的变化,探索中国山水田园诗之所以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不仅仅局限于对王绩个人创作心态和审美情趣的探讨,而是上下串连,把他放在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的总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既有微观的透视,又有宏观的扫描。又如,关于盛唐散文,编者指出,“从总的面貌看,盛唐的散文不如诗歌成就大,这或者因为盛唐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不是散文的时代。”“虽然如此,盛唐散文还是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变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散文的写作缓慢地增加;二是盛唐之音进入到散文的写作中来,给散文带进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情调。”(第343页)对于第一方面,编者对《登科记考》所录的盛唐44位作家在《全唐文》中保存的761篇作品进行分类,用具体的统计数字予以显示。对于第二方面,则列举了李白的那些希求荐用的书信,以及王冷然、任华、王维等人的一些书信作为论据。结论是:“盛唐是一个很富于理想色彩的时代。士人追求功名,急于进取的心态,反映到散文中来,便是一种直白的文风的出现,没有任何修饰地袒露胸襟,可以说是自信,也可以说是无所顾忌,一切都是为了表现自己,辞采的美和文章本身已经不是追求的目标,目标是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情思、欲望、才能、个性。”(第344页)像这种宏观的审视和充满思辨色彩与美学意蕴的精致描述,在《隋唐五代文学史》中随处可见。观点新颖别致,论证细密严谨,做到字字有据,绝无架空之论,这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

与现行几部文学史风格迥异的三部文学史新著,一是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二

是赵明的《先秦大文学史》,三是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这三部文学史新著是从宏观角度,从文化建构的总体着眼,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文学史的成功尝试。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魄和强烈的思辨色彩,使这三部文学史充满了艺术的魅力,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异军突起。

《先秦大文学史》的主编赵明和副主编赵敏俐在1992年第四期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的长篇文章。文章从重构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构想和体例结构原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文中提出“系统、综合、比较”的三维动态结构原则,颇有新意,认为“这样的三维动态结构不仅是体例结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只有运用这种方法,才能使文学史的理论构想通过材料的占有、辨析、选择而具体化为一部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文学史”。文章最后认为,“在古典文学领域,倡行了多年的宏观文学研究,现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入文学史论的宏观理论领域”。这篇论文所提出的理论原则和构想,在79万字的《先秦大文学史》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体现。这不是一部一般的文学史专著,严格说来是一部风格独具的文学史论著。在广阔的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下,展示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揭示各种文体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以及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同时对先秦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生动的历史评价。编著者认为,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构成了先秦大文学的重要特质,使这一时代的文学显现出极为恢宏的文化面貌^⑦。在论述先秦文学与哲理艺术散文的时候,编著者指出,“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产物,它鲜明的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可以说是‘无韵的史诗’、‘历史形式的戏剧’,它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奋斗史,表现了我们民族开拓创造

的性格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从而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两方面,影响了中国后世传记文学、历史戏剧和历史小说的发展,范型着民族文学演进的轨迹和方向。”又说,“中国后世散文家之所以以先秦为楷模,中国散文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屡屡出现回望与复古现象,其实是不奇怪的:站在民族文化的源头和高峰,先秦诸子的思想和艺术上都显示了开拓者的大家风范。”^⑥这些恢宏通达的议论,乃是基于对先秦史传文学和哲理艺术散文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演进历史的宏观审视。像这种闪烁着思辩色彩的论述,赏心悦目,启人心智,这也是《先秦大文学史》一书给予读者的总体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先秦大文学史》已经尽善尽美,已经达到了不可企及的理论高度。本书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显得过于浮泛,思想艺术的分析过于简略,不够深入细致,引文太少,这对初学者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欠缺。像这样的文学史,作为研究生教材或教学、科研的参考书是合适的,作为大学本科或专科教材则显得过于深奥。

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据说是从90余万字的唐宋文学讲义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与赵明的《先秦大文学史》一样,本书也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文学史研究,探讨中唐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所谓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它涉及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诗词、散文、小说、变文诸方面,列举了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材料作为依据。结论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本书的特点,正在于超越了单纯从事作家述评的界限,而把中唐至北宋的文学运行作为一个流程,更将文学史的运动纳入总体文化建构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找出其外部和内部的动因,进而把握住它随同文化建构的步伐一起波动震颤的脉息,这就使各种分散的文学现象得以串连、组合起来,而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子间

的交互作用也才能充分揭示。”(陈伯海《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序》)在中唐至北宋文学发展的链条上,杜甫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是极其重要的线索。作者用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进入交流系统的杜诗”,揭示从“诗史到诗圣的整合过程”。所论凿凿有据,丝丝入扣。作者在博士研究生时期,师从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他的博士论文是120万字的《赵次公杜诗先后注辑解》,主持论文答辩的老一辈专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正是得力于对杜诗精神实质的透彻理解和对杜甫影响中唐至北宋文学进程的宏观把握,所以,作者在论述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既是高屋见瓴,又显得细致入微。从120万字的《赵次公杜诗先后注辑解》到14万字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这个流程似乎透露出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关系的某种信息,它告诉我们,只有对微观研究下过一番扎扎实实的功夫,才谈得上宏观把握,才能从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中,从异彩纷呈的作家作品中进行理论的抽象,找出文学发展的轨迹,概括出一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是一部见解卓越、体大思精的分体断代史著作,它以磅礴的气势,恢宏的议论和充满诗意哲思的文笔,一新人之耳目,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树起了一座辉煌的里程碑。霍松林先生认为,“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有着史诗般的深阔伟美。”^⑦傅璇琮、钟元凯指出,“从学术上说,王钟陵的这本书表现了重建科学的文学史观的严肃企向和尝试”。“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一旦问世,一个新的参照坐标就出现了,以往所有的成果都会在这个坐标上或升或降地变换原先的位置。”^⑧其实,何止“以往所有的成果”,就是此后的所有成果,都将在这个坐标上确定其应有的位置。这部严肃的具有史学与哲学双重品格的文学史论著,已经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震撼,激起新老学者的一致

赞美。王钟陵的学术实践及其成果,昭示了宏观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全新一页。

这部七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是王钟陵呕心沥血建构出来的一座学术殿堂,其堂庑之深奥,雕刻之精工,色彩之壮丽,可谓美不胜收,使人应接不暇。王钟陵是搞古典文论的,“有着长期的对哲学的兴趣”,多年的专业训练,使他养成了“从理论上把握问题的习惯”^①。他对史学、哲学、文学和美学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在中国中古诗歌史领域中,攻克了一个个学术难关,填补了一个个学术空白,阐述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兼具鲁迅的深刻和闻一多的精美,十分难能可贵而又风格独具。要对这部体大思精的文学史论作出全面的学术评价是困难的,对笔者来说也是力不胜任的。这里只想粗略地谈一点印象。

王钟陵在其《文学史新方法论》一书里,系统阐述了撰写本书所遵循的两个原则:一是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二是整体性原则。依据第一个原则,作者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形式,将阐述历史的真实内容与发挥个人睿智才华水乳交融。依据第二个原则,作者将中古诗歌的发展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和民族的审美心理的大背景之下进行透视,展开论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揭示中古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两个原则紧密结合,生花妙笔纵横驰骋,四百年民族心灵史获得了全景式的展示。

依据整体性原则,作者对“历载将百”的、却被历代文学史家鄙弃埋没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东晋玄言诗索隐钩沉,理清了玄言诗的发展过程,确定了玄言诗阶段的上界和下界,同时对郭璞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也作了令人信服的评价。作者指出,钟嵘所谓“淡乎寡味”之“淡”,在魏晋玄学中,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存在的,在士族文人的生活中,又是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交友之道和处事方式的思想范畴

而存在的,反映在文学上,则又专作为一个审美情趣而存在的。这种对于“淡”的审美情趣的追求,使得不少玄言诗表现了恬畅的风貌,它不仅给此后的山水诗以导向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陶渊明诗歌艺术的一个侧面。陶渊明诗歌,正是“淡”与“不淡”的交织统一。所有这些恢宏通达而又精雕细刻的议论,皆发前人之所未发。文学史上的这一大段空白,被作者精心炼就的五色石天衣无缝地填补上了。单凭这一点,王钟陵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足称不朽了。

顺带指出,在完成《中国中古诗歌史》这一巨著之后,王钟陵又在短短的几年内推出《中国前期文化一心理研究》(60万字,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和《文学史新方法论》(34万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两本专著。这三本学术著作,完整地展示了王钟陵学术研究的广阔胸襟和整体风貌。博学深思,勤奋刻苦,这是王钟陵成功的奥秘之所在。

对重写文学史的一点希望

文学史的建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学史研究应该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具有恢宏的气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可以也应该互相涵容,互相结合。文学史著作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种建构,应该允许不同的文学史家采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进行编写。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新著来看,如果从编写体例和性质上划分,又可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学术理论型的文学史(或简称文学史论),二是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三是普及性的文学史。第一种类型的文学史,属于高级学术形态的文学史,它在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对文学史诸现象和作家作品作宏观的审视和扫描,揭示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并给予作家作品以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经过

理论的抽象和升华,必须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就要求作者不但要有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要有超卓的识见和精美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至于教科书和普及性的文学史著作,考虑到读者的文化层次和接受水平,则必须遵循史的线索,以作家作品为纲,分章分节展开叙述,作家生平事迹是不能避而不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的几部文学史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史新著的编写体例还是可取的,不能轻易扬弃。问题是如何加大宏观研究的内容,如何更新文学史的观念,而不在于体例本身。用第一种类型的文学史取代高校目前的文学史教材行不行?我认为是不行的。大学本、专科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史的学习作为基础,那么,他们面对这类文学史著作,必然望洋兴叹,望而却步。这不是主观臆测或危言耸听,这是事实。因此这里实际上反映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第一种类型的文学史属于提高的性质,第二、三类型的文学史属于普及的性质。换句话说,把第一种类型的文学史作为研究生教材是可以的,作为大学本、专科教材则是不合适的。

总的看来,这几年陆续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新著,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无论是采用传统的方法还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无论是文学通史、断代史,还是分体史、分体断代史,文学史家们都力图写出自己的特色,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各种类型的文学史(包括现行的和新出的),适应着各种层面的读者的需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有的文学史可以作为高校中文本、专科教材,有的可以作为研究生教材,有的适用于社会上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和自学者,有的可以作为教学、科研的重要参考书。它们并存互补,共同丰富新时期古

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内涵,激发人们对我们伟大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遗产和文化传统的热爱之情。

至于这些文学史在出版问世以后,在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中,哪种类型的文学史,何人所著的文学史更能切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受到读者的欢迎,更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应,这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经过不同层面的读者的审美判断。当然,强调学术上的恢宏气度,强调兼容并蓄,并不意味着排斥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应该通过批评和争鸣的途径,求同存异,以推进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希望,新时期有更多体例风格各异的文学史著作问世,我们希望文学史研究领域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①⑤见《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关于文学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②见赵明、赵敏俐《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一文,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③这里所谓“现行文学史”是指六十年代出版的现在仍然广泛使用于高校文科教学的文学史著作。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称为“文学史新著”。笔者不用“新文学史”和“旧文学史”、“新文学史观”和“旧文学史观”这种带有褒贬色彩的提法。④详见郭预衡《古代文学探讨集》第一部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几篇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⑥为叙述的方便,文学思想史、批评史和流派史之类的著作姑置勿论。⑦⑧见《先秦大文学史》第10页,第18—19页。⑨见《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评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一文,《学术月刊》1990年第10期。⑩见《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议——从〈中国中古诗歌史〉谈起》一文,《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⑪见作者《我写〈中国中古诗歌史〉》,载《文学史新方法》书后。

(责任编辑:夏 涛)